

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魏佳博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0日

摘要

本研究以译者主体性理论为框架, 系统考察了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历时近二十年完成的《世说新语》全译本。论文采用文本细读与对比分析方法, 将翻译实践划分为译前、译中、译后三个阶段, 分别从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和副文本建构三个方面, 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 1) 译前阶段的文本选择, 体现了译者个人学术旨趣(为我性)与时代学术思潮(受动性)的交织; 2) 译中阶段的翻译策略, 展现了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的能动性因语言、认知局限而产生偏差的受动性之间的辩证制衡; 3) 译后阶段的副文本建构与长期修订, 凸显了译者持续、自觉的能动性介入。文章最终认为, 译者主体性的恰当发挥是基于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深刻理解而进行的创造性转化, 马瑞志的案例可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有益参照。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世说新语, 典籍英译

A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Shih-Shuo Hsin-Yü* by Richard B. Mather

Jiabo W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ly 6,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0,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framed by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by American sinologist Richard B. Mather, a monumental project completed over nearly two decades. Employing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divides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into three stages: pre-translation, mid-translation, and post-transl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three respective dimensions: text selec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paratextual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pre-translation stage of text selection embodi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 academic interests (for-me-ness) and the prevailing scholarly trends of the era (passivity); 2) the mid-translation stage of strategy formulation manifests a 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initiative in handling culture-loaded terms and the passivity that gives rise to deviations due to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constraints; 3) the post-translation stage of paratextual construction and long-term revision highlights the translator's sustained and self-conscious agentive interven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appropriate exercis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onsists in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grounded i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readership, and that Mather's case may offer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hih-Shuo Hsin-Yü*,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世说新语》作为中国中古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生动记录了魏晋名士的清谈玄理、人物品藻与生活情态，是研究魏晋文化与士人精神的重要文献。自问世以来，该书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亦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持续关注。在众多英译本中，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于1976年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全译本，是英语世界首个也是迄今最具学术影响力的《世说新语》完整英译本。该译本历时近二十年完成，并于2002年经全面修订后再版[1]，其注释详实、附录完备，兼具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被誉为汉学翻译的典范之作。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研究以“忠实”为最高准则，译者被视为隐匿于原文之后的“传声筒”，其主体性未获应有的重视。自20世纪后半叶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学界逐渐认识到译者在文本解读、策略选择与文化传递中的能动作用，译者主体性由此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范畴。许钧[2]曾指出，译者主体性表现为“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文本的创造性阐释与重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非孤立的主观行为，而是能动性、受动性与为我性三者的辩证统一，贯穿于文本理解、语言转换与译文接受的全程。

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为理论框架，将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实践划分为译前、译中、译后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分别考察其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副文本建构中的主体性表现及其运作逻辑。以期为译者主体性的个案应用提供实证支撑，并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典籍外译实践提供参考。

2. 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概述

自1957年起，马瑞志开始了《世说新语》的英译工作，历时二十载完成全译本，并于1976年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着手英译《世说新语》之前，马瑞志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文化背景的考察与文献考据，广泛研读各类典籍，并参考诸多学术成果。他在注释中博采众长，精选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的评注，还特别在译本末尾增添了系统的附录体系，提供阅读所需的背景信息与参考资料。这些附录对

书中涉及的人物按姓氏字母顺序进行分类介绍，并附上中文姓名，部分重要人物还详细列出生卒年份及生平事迹。马瑞志在严格依据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延展，既致力于还原故事的整体面貌，也力求塑造出立体而完整的人物形象。

在翻译过程中，马瑞志始终立足于译者身份，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为避免注释过多干扰阅读流畅性，他有意精简了正文中的注解内容，将大量人物背景说明整合至附录一“正文人名索引”部分。同时，对于注释中引用的典籍名称，他采用缩写形式呈现，并在附录三“引书缩写表”中逐一列出全称，以便读者查证。另外，他灵活采用归化策略，将部分较为生僻或难以直接理解的中国文化概念，转化为西方读者更熟悉的表达方式，既降低了阅读障碍，又尽可能保持了原文的文化内涵。这种译介方法，充分体现出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深刻自觉与责任感。正因如此，该译本不仅具有语言转换与翻译策略方面的学术价值，更在文化传播与接受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海内外学界已积累了颇为可观的成果。国内学者的讨论最早可追溯至该译本问世之际。陈荣捷曾指出译本中存在若干较为明显的翻译问题，并将其归为“误解”一类。梁实秋于1990年在《世界文学》第二期刊发《读马译〈世说新语〉》一文，对马译本所附人名、官名、字辞等附录颇为赞赏，对其译文的基本忠实性亦给予肯定，认为尽管存在疏漏，却无损整体价值，某些译笔甚至为理解原文提供了便利。周一良、张永言等文史学者相继发表《马译〈世说新语〉商兑》《马译〈世说新语〉商兑续貂》等专论，在充分认可译本学术贡献的前提下，对其中得失做了逐条梳理。此后，多位国际汉学及翻译学者相继提出修订建议，如夏志清写道，他早在《文学的传统》这本书提起马瑞志教授精译详注的《世说新语》，实是一部空前的美国汉学巨著。任何人研读《世说新语》，随手参阅马氏译本，方便多了[3]。汉学家康达维盛赞该译本为“过去二十五年汉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誉之为一座“真正的宝藏”，并指出马瑞志以英语再现原文神韵方面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4]。丁爱博则认为，马译本的价值不止于正文的翻译，其术语附录以及人名官名等资料的编纂同样极具参考意义，足见译者对该书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与此同时，他也提及译本中存在少量细微失误。此后，马瑞志对原版译文进行了全面修订。新版英译本最终于2002年由密歇根大学汉语研究中心出版。

3. 译者主体性理论概述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

传统翻译理论长期以“忠实原作”为核心评判标准，将翻译窄化为纯粹的语言符号转换，译者的主体价值长期被遮蔽。直至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学界才重新发掘译者在文本解读、文化转译与译文生成中的核心地位，译者主体性也由此成为翻译批评领域的关键理论维度。原作作者、译者与目标读者共同构成翻译活动的三元主体，但三者的地位并不对等，因为“译者主体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主体”[6]。这一观点也为剖析马瑞志等海外汉学家的典籍译介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主体性如果只强调主观能动性而不讲受动性，就会出现任意性和盲目性，导致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失败。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为我性’。‘为我性’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5]。根据学者对译者主体性的总结，译者主体性集中体现为能动性、受动性与为我性三个彼此关联的维度。其一，能动性是译者突破机械直译的核心支撑，译者可依托自身学识完成文本深度解读，灵活选用适配的翻译手段完成跨语言重构；同时结合作品时代背景与文化脉络搭建完整阐释语境，丰富原作的多层内涵。其二，受动性划定了主体发挥的边界，译者无法脱离客观环境自由创作，语言鸿沟、文化规范、时代学术风气、受众接受习惯等因素，都会约束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文调整必须贴合跨文化传播的客观现实。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前提，改造客体、影响客体

以受客体制约、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7]。其三，为我性赋予翻译行为内在导向，译者的价值取向、审美偏好与学术追求会自然烙印于译本之中；同时要求译者辩证看待文本内容，兼顾文本正向内涵与复杂矛盾之处，在客观解读原作的前提下合理释放主体意识，实现原文信息完整、均衡的跨语传递。

马瑞志兼具汉学家与译者双重身份，其译介行为贯穿译前选材、译中转换、译后副文本设计与长期修订全流程，完整覆盖译者主体发挥作用的各个阶段。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三维分析框架既能阐释译者主动的文化阐释行为，又可客观界定语言、认知、时代环境带来的客观局限。同时，该理论跳出传统二元评判思维，能够还原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在文化传播、文本解读、读者适配之间的动态权衡，为中古志人小说类古籍的海外译介研究提供立体、辩证的分析路径。下文将依托这一理论框架，分三方面考察马瑞志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多元实践形态。

4. 译者主体性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并非孤立地显现于翻译活动的某一环节，而是贯穿于文本理解、语言转换与译文接受的全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运作方式与作用机制。在文本理解阶段，译者的知识结构及文化背景深刻制约着其对原文的解读深度与阐释方向；在语言转换阶段，译者的语言能力、审美取向与策略选择则直接塑造了译文的质量层次与风格基调；而在译文接受阶段，译者又需面向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在忠实于原文与服务于读者之间进行动态调适，力求实现原作思想内涵、信息内容与文体特征的有效传递。基于此，本文将从翻译活动的阶段维度切入，把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实践划分为译前、译中、译后三个关联阶段，分别围绕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副文本建构展开分析。结合前文提出的译者主体性三大核心特征，本章设置分层对应逻辑：文本选择侧重阐释主体性的为我性与受动性，翻译策略辩证分析能动性、受动性的博弈关系，副文本建构集中凸显译者长期持续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完整、动态还原译者主体性在典籍英译中的实践形态。

4.1. 文本选择

文本选择是翻译活动的起点，也是译者主体性最早发挥作用的环节。译者选择翻译何种文本，并非随意的或偶然的行为，而是其个人志趣、知识结构、文化立场与时代学术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马瑞志之所以在浩繁中国古籍中择定《世说新语》作为翻译对象，既根植于其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学术取向，也深受二十世纪中期西方汉学转型与京都学派六朝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本节从个人背景与社会语境两个维度，考察马瑞志文本选择背后的主体性动因，以揭示其翻译实践得以展开的深层逻辑。

4.1.1. 个人背景

马瑞志出生于中国保定，父母均为美国传教士。他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十三年，自幼接受中文教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厚而持久的感情。他曾自述：“我对汉学研究兴趣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的父母是传教士，我在保定度过了我一生中的头十三年”[4]。十三岁时，马瑞志赴美继续学业，此后先后掌握了汉语、英语、法语、日语和梵文等多种语言，为其日后在汉学及亚洲研究领域的跨文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马瑞志的学术志趣集中在中国中古时期，尤其对佛教思想与六朝文化抱有持续而深入的研究热情。他曾发表多篇关于佛学义理与佛教碑铭的论文，并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在学术体制内，他曾担任明尼苏达大学及华盛顿大学教授，并先后出任中国中心执行部委员会委员、中国文明委员会主席、中国中世纪小组委员会主席、美国学术联合会基金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人文科学资助委员会翻译项目与学术研究基金部的中国事务顾问等重要职务。译者与汉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处理《世说新语》时兼具语言转换的敏感性与文化阐释的学术自觉，为其译本的质量提供了深层保障。

4.1.2. 社会语境

马瑞志的翻译选择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二十世纪中期西方汉学整体转型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西方汉学正经历从传统经典译介向现代中国研究的深刻转变：欧洲语文学传统所强调的注释、考据与文本批判仍具深远影响，而战后美国学界兴起的区域研究则带来了新的学术视野。后者更加注重语言能力、跨学科方法以及对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的系统分析。马瑞志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及华盛顿大学期间，正值美国中国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他的《世说新语》翻译既延续了欧洲语文学注重文本考据与详实注释的学术传统，又吸纳了美国区域研究对文化解释力与社会结构分析的重视，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附录、索引与人物注释，呈现出学术性翻译向读者友好方向过渡的鲜明特征。

与此同时，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马瑞志赴日本京都访学，与京都学派的学者多有交流。其时日本学界正处于“六朝文化”研究的热潮之中，对《世说新语》的研究尤为活跃。受此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马瑞志开始系统关注该典籍，尤其对其中清谈艺术与语言风格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专论《谈话的美妙艺术：〈世说新语·言语篇〉》，深入分析其中对话的修辞与审美特征，并发表多篇论文探讨该书的人物塑造技巧及“著名儿童”的叙事策略。京都学界的学术风气与研究方法，深刻塑造了他对《世说新语》的文本理解与阐释路径。

在上述个人兴趣与社会学术语境的双重推动下，马瑞志于 1957 年正式启动《世说新语》的英译工程，历时近二十年，于 1976 年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推出全球首个英语全译本。初版问世后，康达维、丁爱博等海内外汉学家相继提出修订建议，马瑞志据此对译文进行全面修订，2002 年由密歇根大学汉语研究中心出版修订版，该书至今仍被学界视为汉学翻译的典范之一。马瑞志希望借助该译本，为西方汉学界构建更为立体、细腻的中古中国社会图景，并实践其“学术翻译即文化阐释”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本身，正是其个人学术前见与时代学术潮流交汇融通的产物。

综上，马瑞志译前文本选择行为充分映射译者主体性的为我性与受动性。其一，传教士童年经历、多语言功底、六朝佛学研究取向构成其内在学术诉求，翻译《世说新语》是贴合自身研究方向的自主选择，是主体性为我性的典型表征；其二，战后美国区域研究兴起、京都学派六朝研究热潮等外部学术环境划定了译者的研究边界，文本选题无法脱离时代汉学发展脉络，体现主体性与生俱来的受动约束。内在学术追求与外部时代环境相互交织，共同推动马瑞志启动这部典籍的英译工程。

4.2. 翻译策略

译者在面对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语言差异与文化间距时，其所做出的每一处策略抉择都直接映照其主体意识的运作轨迹。本节从正反两个维度考察马瑞志的翻译策略。一方面，以文化专有项的处理为案例，分析其在语境判断中如何主动权衡并做出取舍；另一方面，以通假字翻译偏差为案例，审视其主体性在微观语言细节层面所遭遇的认知限度。这两方面的分析旨在较为完整地呈现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策略维度上的展开方式与作用边界。

4.2.1. 文化专有项的处理

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是典籍英译中译者主体性最为凸显的场域之一。这类语汇承载着源语文化特有的制度、物质、观念与生活方式，在目标语中往往缺乏直接对应项。译者在处理此类词汇时，无法依赖任何固定的转换规则，而必须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做出主动的判断与取舍。这种判断与取舍本身，正是译者主体性的直接表征。马瑞志在《世说新语》英译中面对大量魏晋时期的文化专有项，其处理方式呈现出一套可辨识的主体运作逻辑。本节选取饮食动作、器物、官职与佛教概念四类典型个案加以考察。

例 1: 宾客诣陈太丘宿, 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议论, 二人进火, 俱委而窃听, 炊忘著箒, 饭落釜中。

译文: Once when a guest was visiting Ch'en Shih overnight, Ch'en had his sons, Chi and Ch'en, cook some rice. The guest was having a discussion with Shih, and while the two boys were tending the fire they both neglected their work to listen on the sly.

“炊”在古汉语中统指“烧火做饭”, 是一个语义涵盖面较宽的单一动词。若机械直译为“cook”贯穿全句, 可能会造成英文表达的单调与场景描写的扁平化。马瑞志选择将同一“炊”字在前文处理为“cook some rice”, 在后文处理为“tending the fire”。他判断出原文中“炊”承载着两个不同的动作焦点, 并据此在译文中进行了认知层面的动作分解。这一决策透露出译者的主体立场: 他倾向于以目标语读者所能感知的具象场景来重构原文的叙事画面。

例 2: 母好食铛底焦饭, 遗作郡主簿, 恒装一囊, 每煮食辄贮录焦饭, 归以遗母。

译文: His mother was fond of eating scorched ric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pot. While he was superintendent of records for the commandery he always kept a sack ready, and every time he cooked a meal he would always put aside some of the scorched rice in it. On the occasions when he returned home he would give it to his mother.

“铛”是魏晋时期常见的平底炊具, 兼具实用与礼器功能。马瑞志将其译为“pot”, 一个在材质、形制与文化层级上都远为笼统的对应词。读者无从知晓“铛”的平底特征, 更无从感知其作为礼器的文化意义。在此处的叙事语境中, “铛”的核心功能是承托“焦饭”这一情节焦点, 而非展示器物本身的文化内涵。马瑞志的判断是在此刻的阅读过程中, 优先使读者理解情节而非认知器物。以“pot”对应“铛”, 本质上是译者基于当前语境的信息重心所做出的价值排序。这种决策, 正是主体性在准确性与效率之间权衡后的产物。

例 3: 殷仲堪既为荆州……

译文: After Yin Chung-k'an had become governor of Ching Province (Hunan-hupei)...

“荆州”的翻译呈现了另一种主体运作方式。马瑞志在此构建了三层信息结构: 威妥玛拼音转写“Ching”以解决读音问题; 意译“Province”以标示行政层级; 括号内补充“Hunan-hupei”以提供现代地理坐标。每一个层级的选择都是译者主动设计的产物。最终采用的对“荆州”的三层解释体现了他对目标读者认知习惯的主动预判。威妥玛拼音是西方汉学读者的熟悉体系, “Province”对比“state”更能准确传递州的行政规模, 而地理注记则为不熟悉中国古代政区的普通读者降低了认知门槛。

例 4: 此子疲于津梁。

译文: This man's tired after all the ferrying and bridging of sentient beings to salvation.

“津梁”本义为渡口与桥梁, 在佛教语境中喻指佛陀以佛法济度众生的行为。译者的处理呈现出清晰的主体介入痕迹。他并未将“津梁”径直对应为某个英文词汇, 而是将其拆解为两层。“ferrying and bridging”保留字面意象, “to salvation”补足宗教功能。英语语言体系中不存在与佛教“普渡众生”完全对等的固定术语。马瑞志以“salvation”这个深具基督教意涵的术语来承载佛教的救度观念, 是凭借其对目标语宗教文化语境的判断, 主动选择了一种让异质文化进入读者认知框架的类比路径。

综合上述四类案例, 马瑞志在处理文化专有项时展现出一种以语境信息重心为判断依据、以读者认知可及性为调节尺度的主体性运作逻辑。他并非遵循任何单一的翻译原则, 既不执着于文化意象的完整保留, 也不简单屈从于目标语的表达惯例, 而是根据每一处文化语汇在具体叙事语境中所承担的功能, 主动判断什么必须保留, 什么可以牺牲, 什么需要补充。当文化专有项构成叙事情节的核心节点时, 如

“炊”所承载的动作推进，他倾向于分解意象、重构场景以强化读者的情境体验；当器物仅为情节的辅助元素时，如“铛”，他宁可牺牲文化细节的精确性也要确保阅读的流畅性；当文化概念兼具读音识别与功能理解双重需求时，如“荆州”“津梁”，他则选择多层信息的叠加式呈现。这一决策过程所依赖的，不仅是语言能力，更是译者对魏晋文言叙事特征的深刻把握。《世说新语》行文简约，每处词汇承载的信息密度很高，译者必须在有限的篇幅内做出价值排序。马瑞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试图在译文中再现一个完整的魏晋文化世界，而是通过有选择地突显与有意识的隐退，在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框架中重构一个可理解、可感知的叙事场景。其翻译决策既受制于语言与文化的客观差异，又始终以语境判断为依据，在制约之中行使选择的自由。

4.2.2. 翻译偏差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摆脱客观条件的制约，主体性的运作始终存在认知边界。译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前见与注意力分配，既构成了其创造性发挥的基础，也同时划定了其可能触及的阐释限度。尽管马瑞志在翻译过程中努力保留文化信息，但由于中文文化内涵丰富，文言文复杂深奥，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翻译偏差现象。通假是古汉语文献中普遍存在的用字现象，指作者以音同或音近的字替代本字。若译者未能识别通假关系，将假借字按字面义理解，便可能产生语义偏差。《世说新语》中“常”与“尝”的通假关系即为一例。

《识鉴》第23则载：“(谢)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句中“常”实为“尝”之通假，意为“曾经”，指某一次具体事件中的情绪反应。马瑞志将其译为：“...whenever he was in a crowd, he would say...”，以“whenever”对应“常”，将单次事件理解为习惯性行为，与上下文所描述的特定情境明显不符。同样的误读出现在《言语》63：“支道林常养数匹马”，马瑞志译为“always kept several horses”，仍以频率副词处理，未能识别“曾经”之义。

但马氏并非不知道“常”可通“尝”，只是在具体判定的时候偶有疏失[8]。在《赏誉》62“常聚集”一句中，他正确地将“常”译为“one time”，准确传达了“曾经”的含义。这一得一失的对照表明误译的根源不在于译者汉语能力的整体不足，而在于特定语境中认知注意力的偏移。在快速推进的翻译过程中，马瑞志的学术精力主要集中于魏晋思想、人物品评与清谈话语等宏观层面，相比之下，通假字等微观语言细节在其注意力层级中居于相对边缘的位置。马瑞志的学术型主体性成就了译本的思想深度与佛道阐释的精准性，却也使微观语言细节等维度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前者。

结合文化专有项灵活译法与通假字两处翻译偏差案例，可清晰看见译者主体性内部能动性受动性的辩证制衡关系。处理文化专有概念时，译者主动重构叙事画面、增设多层文化注释、选用适配西方读者的类比表达，充分释放翻译转换阶段的主观能动性；但古文通假用字规则、译者注意力分配的客观局限形成阐释边界，造成局部语义偏差，凸显主体性无法摆脱外部客观条件约束的受动特征。能动性是译者实现创造性文化阐释的核心基础，受动性则划定主体发挥的合理边界，二者始终共存于翻译全过程。

4.3. 副文本建构

马瑞志译本由前言、正文和附录三大部分构成，全书共计741页。前言部分包括《自序》《导论》和《附志》，其中以《导论》篇幅最长、学术分量最重。译者在此系统阐述了《世说新语》的成书背景、文本流传、历史语境及魏晋文化特征，实质上为读者提供了一份独立的学术导览。《自序》与《附志》则分别记述了翻译的缘起、过程及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三者，使得读者在进入正文之前便已获得理解文本所需的基本知识框架。

附录体系是马瑞志副文本设计的核心。全书设《传略》《释名》《缩写》《书目》和《引得》五种附录，其功能各有侧重：《传略》按字母顺序编排书中人物，附有中文姓名、生卒年份及生平事迹。《释

名》对官职、地名、典章制度等进行集中解释。《缩写》与《书目》则为学术查证提供工具性支撑；《引得》便利了文本的检索与引用。五者合在一起使译本同时具备了面向专业研究者的工具属性和面向普通读者的可读潜质。

马瑞志有意精简了正文中的随文注释，将大量人物背景与名物解释移至附录一《传略》之中；对于脚注中引用的典籍名称，则采用缩写形式呈现，并在附录三中统一提供全称对照。这使得正文保持叙事的连贯性与阅读的流畅性，而学术信息则被记录于独立的附录空间中，由读者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取用。译者对副文本的结构化设计，体现了其对不同读者群体的差异化关照。

1976年初版问世后，康达维、丁爱博等汉学家相继提出批评与修订建议。马瑞志并未固守初版成果，而是在此后二十余年持续吸纳学界反馈，对译文及副文本进行了全面修订，最终于2002年由密歇根大学汉语研究中心出版修订版。

从译本前置导览文本、分层分类附录体系到二十余年持续修订行为，整套副文本设计完整凸显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特质。马瑞志主动搭建分层阅读框架，拆分注释、人物传略、检索索引等学术工具，兼顾专业汉学研究者与普通西方读者的差异化阅读需求；初版出版后持续吸纳学界批评意见，迭代优化译文与配套副文本，将翻译视作开放、可对话的长期学术工程。这类兼具规划性、反思性与持续性的文本建构与修订行为，早已超越单纯语言转换层面，是译者主动开展系统性文化阐释的高阶能动实践，也为中国典籍海外学术译本的副文本设计提供了参照范式。

5. 结语

本文依托译者主体性理论，结合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三重维度，从译前、译中、译后全流程剖析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实践，厘清译者主体性在典籍译介中的运作逻辑与内在边界。

译前文本选择是译者内在诉求与外部学术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中呈现主体性的为我性与受动性。马瑞志基于自身汉学研究取向选定译介文本，同时又被20世纪中后期西方汉学发展趋势、京都学派学术风潮所约束，个人追求与时代语境共同左右其翻译选题。

译中语言转换阶段，能动性与受动性始终相伴制衡。处理各类文化专有概念时，译者灵活调整译法、适配西方读者认知，充分施展主体创造空间；而古文用字特点、译者认知精力分配等客观局限，又形成阐释边界，催生局部翻译偏差，印证主体性无法脱离客观条件无限发挥。

译后副文本体系搭建与跨二十年持续修订，凸显译者长效、自觉的主观能动性。马瑞志通过分层设计前言、附录、检索工具适配不同受众，且主动吸纳学界意见迭代完善译本，将翻译视作可对话、可修正的长期学术工作，为典籍海外学术译本的文本架构设计提供参考。

马瑞志的译介实践表明，典籍英译的译者主体性是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辩证统一。译者需依托自身学术积淀合理发挥创造能力，同时正视语言、文化与认知层面的客观制约，平衡原作内涵传递与海外读者接受需求。本研究也为当下中华典籍对外传播提供借鉴：优秀的海外汉学译本需要译者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以持续反思的译介思维，助力中国古典文化实现更立体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 [1] Mather, R.B. (2002) 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2nd Edit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ttps://doi.org/10.3998/mpub.19860>
- [2]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 2003(1): 8-13.
- [3] 范子烨. 馬瑞志博士的漢學研究[J]. 世界汉学, 2003(1): 140-142.
- [4] 范子烨. 马瑞志的英文译注本《世说新语》[J]. 文献, 1998(3): 210-229.
- [5]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1): 21-26.

- [6] 王正良, 马琰. 译者主体性的多维度构建与博弈[J]. 外语教学, 2010, 31(5): 107-110.
- [7] 王玉樑. 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 天府新论, 1995(6): 34-38.
- [8] 龚波. 古籍英译失当举隅——以马瑞志英译《世说新语》为例[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5(2): 10-16.